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褚葆一 陈彪如 储玉坤

从1979年开始的这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经历了1980年和1981年连续两次生产下降之后，于今年1月美国首先开始回升，随后其他国家也陆续回升。但回升都是无力的。

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1973—1975年经济危机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陷于“滞胀”的困境。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不论在深度、广度和经历的时间上，都超过了1973—1975年那次危机。现在，各国经济虽然陆续回升，但从客观的经济现实来看，各国都不可能出现危机过后的高涨阶段，只能重新回到“滞胀”的困境。

面对“滞胀”这个不治之症，看来西方国家还是要乞灵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施各种干预经济的政策，以使资本主义“延年益寿”。不可否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竭尽全力干预经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实也能起一些作用，收到一定的效果。例如

当通货膨胀率扶摇直上成为当时的头号经济问题时，由国家实行严峻的紧缩政策，把通货膨胀率从高峰压下来。

但是这种反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英国带来了工业生产萎缩和高失业率，至今失业率仍在13%以上；在美国也使工业生产下降11.9%，失业率保持在10.4%左右。这种头痛医头的政策，得不偿失，何况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总之，这次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各国经济又将回到“滞胀”，不可能出现高涨阶段，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起伏，三、五年后又将发生一次危机。从“滞胀”到危机，又从危机到“滞胀”，循环往复，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刘石摘自《世界经济》1983年第7期）

工业新扩张可能始于九十年代

姚曾荫

到二十世纪末叶为止的世界经济形势应该如何估计？综合起来，影响今后世界经济形势的，不外乎两方面因素，一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是促使世界经济停滞的因素。世界经济发展的快慢，要看这两股力量的强弱与对比。

促进增长的因素是：（1）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电子学领域的革命和生物化学（遗传工程）领域的革命；（2）反失业政策将会增加就业和生产；（3）对新能源的研究及对改善原有能源的生产和运输的研究和投资，将会增加开支和生产；（4）国防开支的增加有助于军用生产的增加并带动民用生产的增长。

促使趋于停滞的因素：（1）能源价格。估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石油价格将会大致

稳定在每桶29美元左右，而这以后到2000年，油价将会上涨；（2）贸易保护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减少失业或阻止外国进口货增长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降低世界贸易的增长率，并影响到世界工农业生产；（3）反通货膨胀政策。这样将会减少各国的财政开支，紧缩货币流通量，增加失业人数，对有关国家的经济产生紧缩性的影响；（4）固定资本投资的脚步不前导致工业生产增长缓慢。

这两组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力量也是不同的，并且这两股力量并不是必然会相互冲消的。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情况将会是七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情况的继续，仍将是停停走走，低速增长的局面，其增长率为2—3%。在九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可能稍有增加。这是因为西

方工业国家的反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可能改变为反失业的再膨胀政策。同时，在生物化学、电子学、新能源、光纤通讯、新材料等领域内，将产生一个新的技术革命，从而一个新的世界工业扩张时期，在九十年代可能开始形成。生物化学工业将是九十年代领先发展的工业部门。估计九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在3—4%。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重将增长。它们可能是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有几个国家可能赶上西方工业国家的工业水平，出现两三个今天的日本。

（虞 放摘自《世界经济导报》1983年第142期）

当代西方宏观福利理论述评

厉以宁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浦斯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关系的论点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宏观福利问题的讨论大大深入了一步。这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交替条件下，如何使福利最大化？

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情况，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菲利浦斯曲线关系提出了怀疑。关于菲利浦斯曲线向上移动的论点也好，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是暂时交替的论点也好，都表明它们承认菲利浦斯交替关系的恶化，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已经交织并发，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复杂化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对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生活发生了全面的影响。于是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福利经济学问题不仅不能只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考虑，而且也不能只从假定存在充分就业或者假定存在过度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就业水平，或零通货膨胀率条件下的失业代价，成为当前宏观福利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换句话说，这方面的重要研究项目就是所谓在尽可能低的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降低失业率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美国经济学家托宾1971

年12月28日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第84届年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说《通货膨胀与失业》中，曾这样说道：“至于宏观经济政策，我已经主张它应争取失业在零通货膨胀率下达到更低的目标。降低多少失业呢？低到足以使失业与空位相等吗？我们不知道。理所当然地没有简单的充分就业公式——概念的，更不必说是统计的。社会不可能避免非常困难的政治上与时间上相互间的选择。随着我们更加清楚关于劳工市场、流动性、寻业，以及更加弄清楚失业与通货膨胀两者在社会上和分配上的损失的时候，我们经济学家们是能够说明这些选择的。继凯恩斯之后35年，福利宏观经济学仍然是有关系的、挑战中的主题。我敢相信，它有灿烂前途。”

从托宾的这段演讲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宏观福利理论所要探讨的零通货膨胀率或低通货膨胀率下的低失业率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协调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以便使这种交替成为“最优的”。为此必须对通货膨胀与失业造成的分配上的“损失”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是如何从社会上、政治上来选择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点，以便使这种交替成为可以被社会所接受的或容许的。为此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与失业所引起的社会动荡或政治不安定进行研究。

（凌 甘摘自《世界经济》1983年第7期）

战后资本主义贸易壁垒变化的经济意义

胡松华

二次大战后，尽管贸易自由化盛行，但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却从来没有消失过。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保护贸易政策，更加广为实施，贸易保护的措施变得愈益多样化。世界各国在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上的矛盾斗争，成了各国经济贸易关系上的一个热点。贸易壁垒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无疑同资本主义经济内容有着内在的复杂的联